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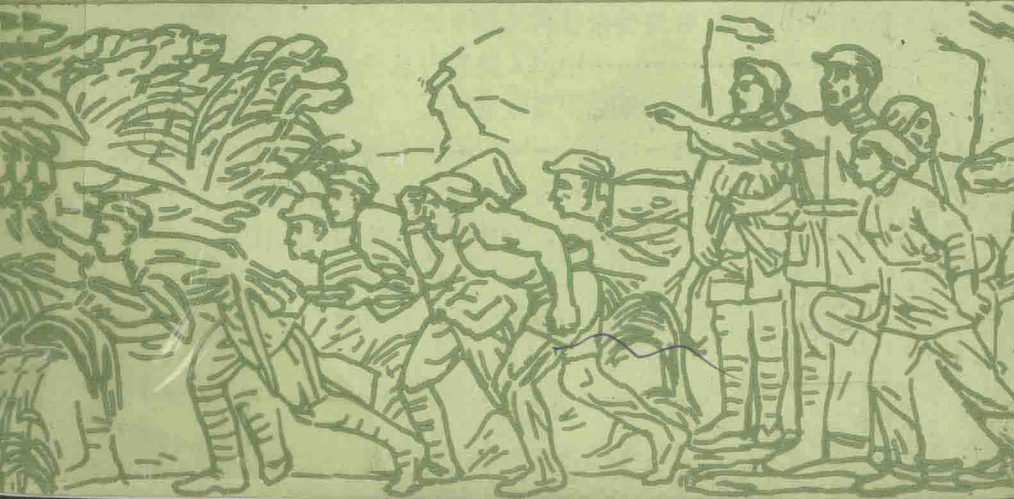


4

1985

近代史 研究

JIN DAI SHI YAN JIU



1979年10月创刊

近代史研究

4

(双月刊)

总第28期7月出版

论历史学理论研究.....刘大年(1)

* * *

共产国际的俄国革命模式与中国国情的矛盾.....王廷科(20)

六大以前党中央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形成过

程中的贡献.....梁尚贤 郭德宏(42)

·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二) ·

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刘大可(61)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郭传奎(78)

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袁 加 李兴仁(88)

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孙果达(119)

试论冀察政务委员会.....凯 蔡德金(140)

* * *

建国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述评.....孔祥吉(161)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

研究述评.....蒋 俊 李兴芝(193)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资本积累.....何 钧(210)

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辨

——兼与罗尔纲先生商榷.....杨其民(241)

刘铭传在台湾领导抗法斗争的几个问题.....杨彦杰(262)

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汤志钧(280)

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 吕一燃(294)

• 书 刊 评 介 •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简介 严学熙(302)

• 读 史 札 记 •

关于康有为写《日本变政考》的两个问题 王魁喜(305)

王国维的号“人间”辨析 周一平(309)

• 史 学 动 态 •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与历史研究》讨论会综述 (314)

《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目录

(《近代史研究》专刊)

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数的几个问题·····	谢雪桥
英国政府与“阿思本舰队”·····	吴乾兑
赫德在中国·····	叶凤美
略论《中俄伊犁条约》关于西疆分界的条款·····	李之勤
伊犁交涉与资本主义列强·····	董志勇
宗方小太郎与中日甲午战争·····	吴绳海 冯正宝
甲午中日战争与俄日关系·····	李嘉谷
三国干涉还辽与国际外交·····	孙克复
英国政府与戊戌变化·····	邵立新
日俄分割东三省的朴茨茅斯和约·····	杨诗浩
关于第一次日俄密约·····	石楠
司戴德与币制实业借款·····	李丹阳
民国初年沙俄对阿尔泰地区的侵略·····	吕一燃
1924—1927年日本对华政策	

——论“币原外交”的特征·····沈予
花旗银行与湖广铁路借款资料选择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编译小组
建国以来近代中外关系史主要论著目

录索引(1949—1983)·····良永

本书为《近代史研究》专刊之一种,由《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欲购者可直接与该社联系。

论历史学理论研究

刘大年

历史学理论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

历史研究中讲的事情各种各样，大致加以区分，可以归为史实、具体问题研究的部分和理论研究的部分。所以说大致，是这种区分，有能够明确划分界线的，有不能截然分开的。

翻开任何一部历史书，上面无不写着一连串的一定时间、地点发生的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历史研究必须首先弄清楚那些事件及其有关的史实。不论题目大小，问题简单还是复杂，先要解决事实究竟如何，然后才谈得上对它的认识如何。五十年代初，报刊上讨论电影《武训传》。有篇文章说，武训兴学出现在几百年以前，值得歌颂。另一位作者马上指出：文章发了许多议论，连武训为何时人都没有闹明白，我们怎么能够相信那些议论是有根据的呢？历史研究要解决的重大事件，要说明的问题，比武训其人其事不知道要复杂多少，重要多少。那些事件、问题，或者由于时代久远，记载、实物缺失而淹没不彰；或者记录本身篡改、掩盖真相，不足凭信；或者事实不虚，但不反映历史的本质。资产阶级公然伪造历史，更常常需要提防。历史家们必须耗费大量的劳动，去研究那一桩桩重大事件，那一系列具体问题，为理所当然。不这样，历史研究工作在开步走以前就得停止下来。

可是史实的研究了解，并没有尽到历史研究的全部职责。对史实的了解，不能代替、也不能脱离一定的观点、分析，了解史实不能处于认识的真空状态。哪些观点、认识可取，哪些不可取，依据什么？这个任务就只有由理论研究来解决。

理论指导，在一切基础的科学门类中都占着重要地位，自然科学也不例外。一些著名的大科学家早就指出过，天文学没有理论指导，就无法进行观察；其他自然科学没有认识论，就是原始的，迷惘纷乱的。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变迁、人们的社会关系、他们的活动和斗争，更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理论指导、理论研究。一个历史家并不只是要简单地记住事件经过，人物活动就行了。历史家有两个任务，一要准确地知道何时何地发生了怎样的事件；二要表示出那些事件的“价值观念”。事实上，每个研究者叙述事件经过、人物活动的时候，总要带有某种看法、判断或评价。《春秋》上的“元年，春，王正月”、“郑伯克段于鄢”之类，《左传》、《资治通鉴》等书上的“君子曰”，“臣光曰”之类，是作者评价事件、人物的一种方式；作者夹叙夹议，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传递给读者是又一种方式。我们不能以为那些评论和夹叙夹议中的思想、观点不构成系统的理论形态或某种模式，就以为它们也不构成理论的实质。资产阶级学者里面有人说：我的任务是把事实讲出来，至于如何认识、评价，那是你的事。这是一种遁词。他在叙述事实的时候，自己的看法也就在里面了。何况除了单纯的考证，研究一个问题，绞尽脑汁，最后什么认识也不足以表示，那种研究的价值，十之八九也就可想而知。

历史学应当重视理论研究，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也不是现在才有这方面的研究。它们由来已久。西方早期的历史学者，认为历史起源于讲故事，无所谓观点或理论。其实这也是一种理论。后来西方学者讲历史哲学、历史方法论的著作，层出不穷。许多旧说被人遗忘了，许多新说又接踵出现。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主张理论与史实必须同时并重。据说孔子最先根据周代列国史书上的“事”，从中发明了他所认为的“义”。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从这时起，就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上进一步说：讲历史，要重视“义法”。他认为《春秋》那部著作“约

其文词，制以义法”，是值得效法的。“法”指方法，即如何处理资料；所谓“义”，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观点、主义，或者理论。近代有人评论“义法”问题说：“义，属于主观者也，其为物也，因人而异；法，属于客观者也，其为事也，应用如一。义只可以意会，法则可以言传；义只可以藏之己，法则可以传诸人。故后之治史学者，少言义而多言法，因义随时变，而法执一故也。”^①中国封建历史学的“义”，指所谓“笔削褒贬”、“正统”、“书法”之类。从《春秋》公羊传起，不少人对“义”作过解释，都不算周详。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一一列举“义”的内容，才灿然大备了。它表面上非常精密，实质上不过是字眼、概念的掉弄，并不能告诉人们历史的客观实际是怎么一回事。封建统治者无例外的要从历史上寻找自己统治权的合法根据，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环境条件又各不相同，反映那种需要的历史书，对历史事件、人物的“书法”也就跟着改变，毫无客观标准可言。说它们“纯属主观，因人而异”是很正确的。但这绝不表示观点理论对于封建时代历史家们并不重要。相反，“书法”“褒贬”的争论和斗争，充满旧的历史书撰述过程。那种斗争有时甚至相当激烈，史官们因此被贬谪杀头的屡有所闻。我们今天讲的理论研究，是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产物，是一切先进思想文化批判继承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最开放，最能防止自己受到一切束缚和禁忌，它只追求客观真理，科学地解释世界。它决不象资产阶级的偏见所认为的那样，似乎是某种“宗派主义”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东西，会束缚人的思想自由；相反，它使人们从各种陈旧思想束缚、封闭中摆脱出来，站在科学思想的最新水平上来真正地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资产阶级偏见认为，历史应该“不偏不倚”，以为强调观点、理论，就会不客观，不公正，“移史就观”。它的意思很明白：不同意某种观点、理论，而主张另外的观点、理论。

① （美）传龄著，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陆懋德：《序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给这门科学的前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历史学本身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决。一些科学理论著作，常常开门见山，先讲本门学问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那么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人们可以听到各式各样彼此冲突的回答。这说明历史学与人类进入文明一样古老，而它的研究对象至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决、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谁也不会怀疑，凡过去的一切事物，都是历史事物。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认为，历史唯心主义也这样认为。然而这并不等于凡过去的一切——从自然界到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是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在各个方面都矛盾、分歧，难以设想，它们偏偏在历史研究对象问题的看法上，毫无二致。历史的现象何止五光十色，它们所反映的本质的东西，应当就是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对象的东西。何谓历史的现象与本质、是否需要或者如何区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分歧首先就来自这里。举出这个例子，说明应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建立起体大思精的历史学理论体系，还要做许多工作。提高历史科学水平，不能缺少资料、史实的深入发掘、研究，但把现象、表面的认识提高为本质的认识，把零散、矛盾的认识提高为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只有依靠理论研究。理论水平的高低，反映历史学水平的高低；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也就是整个历史研究不断前进、深化的过程。

历史学理论研究中关于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理论的问题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结合具体事实作过论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以后，美国一家报纸指责说，那上面讲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

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马克思回答说：“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在历史学理论研究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们最熟悉、最经常引用的理论。

历史运动不断前进，就象对所有事物的认识那样，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认识也必然不断前进。我们一般熟悉、懂得了，还需要经常汲取新的、创造性的思想，使它更加丰富、完善，然后去更准确地解释历史。一切真正的科学研究都是创造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一切对马克思主义有发展、有贡献的著作，给历史学理论研究的创造性提供了典范。它们的生命来自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来自科学的创造性。思想理论战线和其他战线目前正在热烈学习、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文献。其中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与历史学理论直接相关，应当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是什么？《决定》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目前这种矛盾主要来自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一种特有的现实，即来自社会主义改造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模式。正是从这个矛盾出发，《决定》中制订出一整套根本性的方针、政策，改革现有模式。其目的是克服现实生活中前进的障碍，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社会

^① 《马克思全集》，第23卷第99页注33。

主义社会的矛盾，以前存在各种观点，主张，有的针锋相对。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和中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合，成为一个天天讲的空前尖锐的问题。不过直接的话并非讲生产关系，而是讲阶级关系。那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以及同类的其他口号。阶级斗争、革命，都是讲的生产关系问题，而不是讲的生产力问题。按照这个理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存在矛盾，但矛盾主要来自旧社会遗留的生产关系没有彻底解决。那里面有资本家的定息、集体化了的农民中的“小生产”、职工的工资差别以及意识形态的某些内容等等。也就是说，问题主要来自旧生产关系的遗留那个方面，不在于生产力低下这个方面。人们的生活中存在差别、不平均，妨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解决的办法，是向生产关系打主意，缩小差别，减少不平均。这个矛盾理论付诸实行，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它的后果如何，早已人所共知。社会主义社会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它们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的名义提出的，政治上、理论上都不容许挑战。一个时期里，它们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广为宣传，教人信而不疑。现在《决定》上讲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把那些长期被看做不可侵犯的东西一举推翻了，而且作出一系列深刻改变实际生活的决定，使那些理论、观念只有作为反面经验才令人觉得有意义了，这该是何等的革命创造精神！

不谈客观根据、条件，光讲创造精神，容易使人联系到幻想和空想。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遵循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现代化，也只有这样去实现。《决定》的创造精神，归根到底，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来自实事求是。

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伟大而又不平坦的三十几年。

中国十亿人，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集中到一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但不应当、也不可能固定于某种模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差别，在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难以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消灭阶级剥削，不能消灭差别。承认差别，创造条件去缩小直至消灭差别，首先就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老祖宗讲过，本本上有的，把它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老祖宗没有讲，本本上没有的，用中国的生活实际去加以充实发展。《决定》就这样实事求是地做了。没有这种实事求是，理论的创造精神也就根本无从提起。理论一定要反映实际，要建立在牢固的实际基础上。否则不会成为科学的理论，不会有利于科学的建设。研究重大的理论课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研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不同。

《决定》是一个近在眼前的事例。那上面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创造性论述，向我们指出：

第一，历史学理论研究首先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进行创造性的研究。遵守科学原理，才有正确的方向。我们可以这样问一问：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生产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人类社会历史从资本主义进到共产主义，是极其伟大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开始就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其间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历史阶段。其所以必须经过这个阶段，是因为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可以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提高人们走向共产主义的自觉性。到那时，才可以最后战胜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劳动生产力低下、贫穷、物资缺乏，人们只有要求“平均”，而又终归陷于空想。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人们就不需要私人占有财富，可以实行共产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亚圣”孟轲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昏夜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孟轲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他只能幻想由某个圣人来把救

粟变成水火那样之多，使所有人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不过他的话无意之中合乎一个科学原理：共产主义要在极大丰富的物质基础上去实现。列宁说，黄金在世界上有一天会用去盖厕所。意思也就是说，剥削制度消灭，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以后，黄金也失去它的私人占有价值，只有作为公共建筑的装饰物去使用了。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也无法解决的这个问题，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彻底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讲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集中讲这个问题的。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启发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就是意味着保证社会主义不倒退到资本主义，最后战胜资本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所在。至于怎样最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谁也没有给我们制订某种模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上的论述，现在也没有人把它作为模式看待。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新事物。它的客观规律还有待于人们去充分掌握。一部中国近代史向我们大声宣布的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头一条就叫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决不等于坚持某种模式。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回事，坚持某种模式是另一回事。不能把两者混在一起，混为一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又不局限于某种模式，目的是最快最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的增加劳动产品，丰富社会财富。凡是足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加速战胜资本主义的，都是可行的，应当采取的；反之，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改革或者排除的。模式如果必不可少的话，它只应该服从道路，不能相反，道路服从模式。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封建制都表现过自己的生命，又都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什么理由固定于某种模式呢？人的认识不能逃脱实践的限制，经过实践，实事求是，又可以跳出那种限制。我们经过三十

多年的实践，以前不认识的事物，现在认识了。这完全合乎认识发展的规律，合乎逻辑。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又实事求是，人们的认识就前进了。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这样，研究历史、历史学所有的理论问题也是这样。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一个复杂问题。现在我们在讨论，国外也在讨论。苏联报刊上不久以前就连载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距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毕竟只有三十多年，现在继续同资本主义世界交往。旧制度的“印记”——而且尚非浅显的“印记”在我们这里不但目前没有消除，今后一个相当时间里也不会迅速消除。我们说，目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主要来自社会主义改造中逐渐形成的现在已经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模式，并非认为旧的矛盾、“印记”已不存在。旧的矛盾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尖锐爆发。矛盾有主有次，解决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环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这是正确的观点方法。

第二，历史学理论研究，要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历史的矛盾运动，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过去我们对于一定社会制度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合与不适合，似乎有一种看法：要不，矛盾；要不，适合。实际情形比这复杂得多。《决定》上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崭新内容，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中才存在，阶级剥削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但是每当一种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如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的时候，先进与落后、适合与不适，交织在一起，彼此矛盾斗争，更必然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英国资本主义前期就出现了工人罢工斗争、宪章运动，实际上那里的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成熟不久，生产力还大有发展余地。同样，相反的情形也到处能够找到。辩证法对历史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就包含对它们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事物现存的运动形式，都看作它们的内在矛盾运动和不断自我改造、否定的形式。抓住其中的一点一面，简单绝对，那样的看法都不

符合实际。深入这方面的研究，会推进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使一些复杂现象得到科学解释。

历史学理论研究中关于生产力内容的问题

历史学理论研究中探讨生产力的内容，涉及一桩往事。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学者对于生产力的内容由哪些要素构成，有过热烈的讨论。他们分为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生产力由人的劳动力、生产工具所构成，即所谓“两要素”说。一种认为必须加上劳动对象，即所谓“三要素”说。现在我们不是从经济学角度，而是从历史学理论来讲这个问题。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在历史前进的同一过程里。丢掉其中一面，就不存在另一面。生产力、生产关系又各有自己固定的内容，只强调这个部分便会造成忽视那个部分。就象不重视生产关系变革、阶级斗争就不能全面说明历史怎样前进一样，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技术革新和革命，也决不能全面说明历史怎样前进。以往我们了解生产力理论，恰恰严重忽视了技术基础、技术革命这个方面。

斯大林在《联共党史》上说：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当然是由参加生产的人们所实现，而不是与人们无关，所以，由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人们，即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原素，也随着变更和发展起来，他们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更和发展起来。”^①

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解释生产力，也仅仅重复说，随着生产工具的改变，“和生产工具密切相联系的人们，即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也发展了，他们的劳动技能也发展了。这个论述很明白，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原素”，强调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虽然也说到“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对于科学技术的地位却只字没有道及。《联共党史》上的论点，长期支配学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中文本，第156页。

术界的看法。六十年代，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目的和实践效果，都是强调讲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不重视讲生产力，不讲科学技术，更加深了这种看法。批判“唯生产力论”所持的理论根据之一，是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上讲过：“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①似乎马克思是把“革命阶级本身”作为“生产工具”来看待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马克思这段话是讲革命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并非讲人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讲人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怎么也不会把革命阶级本身变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这类误解，也使过去我们对生产力的理解，成为片面的极不准确的了解。

马克思怎样讲生产力呢？科学技术革命、机械的完善、使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分析英国产业革命，指出它发展的方向和前景，是机器成为最完善、最适当的“自动的机器体系”。这种自动机器体系“由许多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组成”。“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②。“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保守的”。自动机器体系在细节方面还会不断改进。“‘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蠢话，特别适用于现代工艺学”^③。最完善的有“人类头脑器官”、“有智力”的自动机器体系，不用说，也就是高度科学化、自动化、智能化的体系。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谁也不知道何谓电脑、机器人，可是这种“有智力”的自动机器体系的应用，对人的劳动和整个生产过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马克思作了详尽的具有惊人科学预见的分析。

① 《马恩全集》第4卷，第197页。

② 《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8、219页。

③ 《马恩全集》第23卷，第533、523页。

他说：那时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从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它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它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的形式”^①。这个论述的极大重要性是容易看出的。社会财富的巨大源泉，由人的直接劳动变为人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给以监督、调节；财富的尺度，由劳动时间变为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现实财富表现为已消耗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空前的不成比例上，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的生产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而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决定性事实造成的：有“人类头脑器官”的自动机器体系进入生产行列。

新技术革命改变生产力的性质，并且必然使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现在，即马克思所论述的这种前景，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深刻、突出，无可置疑。事情很明显，讲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从中抽掉科学技术、自动机器体系——它们现在称做电子技术、智能机器人的内容，就等于从中抽掉了资本主义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自我爆炸和自我改造的物质力量的基础部分，抽掉了生产力的崭新内容。照这样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客观上造成把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成为一种半唯物论的东西。

科学的所以有力量，因为它反映客观世界的实际状况。马克

^① 《马克思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

思的生产力理论在书本上遭到忽视的部分，由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新现象所提供的最大量、最生动的证据，使它本来的光辉充分显示出来了。这是足以发人深思的。

今天，世界上一次新的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讨论这场技术革命或革新的论著，有把它们分为微电子技术、宇航工业、遗传工程、海洋工程等四个领域的，有加上新材料、新能源分为六个领域的。电子技术与计算机在它们中起着带头的作用。西方一些研究者称呼新技术革命是“新文明的诞生”，或从所谓“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美国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相当的代表性。托夫勒、奈斯比特极力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阶级对抗，说“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这就是美国的简史”；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使“跃居于权力之巅的是组织者”；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到资本主义就不再发展了，资本主义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力量，最有向心力，最有扩张性的制度”，等等。但他们费大量篇幅去论述的，是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由此所卷起的历史潮流巨变。作者引用各种资料，说明从经济领域的劳动方式、生产组织、产业结构，一直到国家形式、家庭关系、社会规范、意识形态，都正在或即将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发生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变化和变革；而有关国家政府的政策、议会立法、当局者的言论和采取的对策等，又与这种变化和变革的“大趋势”相抵触，不相适应。他们直率警告：“不迟早面对一次潜在的爆炸性的政治革命，是不可能的”（《第三次浪潮》，第二十六章）那些论述看来自相矛盾，论断分析也远不深刻，没有说出事情的本质。但那些论著的可贵之处，是敏锐地觉察出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脚底下正在强烈震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顽强地要求保持资本主义统治，经济领域中，新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浪潮，又从基础上一天天破坏旧生产关系，挖空资本主义统治的墙脚。社会生活中这种深刻矛盾无法调和，只能由一场全面变革去解决。马克思所分析的“有智力”